

他弄了“半拉子”工程却获提拔

曾有廉州府钦州人章献中任过大理州通判颇有政声，巧的是，明崇祯年间有位叫“杨为楨”的钦州知州是大理人。

当然这只是历史的巧合，当时只有“五百里内不为官”的避籍制，并没有什么“干部交流”。

杨为楨家在大理太和。太和就是大理的下关，现在太和城遗址还在。

我曾去过下关，大理著名的“风花雪月”，“风”指的就是“下关风”，与“上关花”“苍山雪”“洱海月”并列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风太大，把太和城给吹没了，要不然今日或许还能有一个“杨为楨故居”。

读历史有个好处，就是不管你旅游到了哪个地方，那里常有如逢故人的惊喜：这是谁的老家？谁曾在此流寓？在谁的诗文里出现过？此地曾发生过什么事件？……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先读些书再行路，感受和收获自是不同。

这个杨为楨是太和的举人，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到钦州任知府。他在钦州搞了几项工程，有的搞成了，有的没有搞成。

钦州的钦江穿城而过，江北为阴，江南为阳，杨为楨想在江南的山上建一座塔（**议建塔于阳江之冈**）。

地址选好了，目的也很明确——“以培风水”。

塔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，最早用来安置佛骨（舍利子），属于佛教建筑，后来与道家的风水学结合在一起，塔成了镇妖压邪的工具。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杨子荣打虎上山对的暗号就是“宝塔填河妖”。

杨为楨修这座塔倒不是为镇妖。明清科举盛行，读书成为人生唯一出路。一个地方科举不彰，人才寥落，民间的说法叫“不出人”。

“不出人”最大的嫌疑就是“风水不好”，需要建塔来培风水、改文运。

的确，从形式上来说，一座高大巍峨的宝塔，自有激励引领作用，就像一盏明灯、一面旗帜，鼓舞着童生士子悬梁刺股，孜孜不倦，树雄心，立壮志，中举人，当进士，荣华富贵享不尽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

插句闲话，合浦县城的文昌塔，也是为了在科举中多出人才而建的风水塔，什么犀牛出现，皇帝担心被夺皇位而建成鞭状宝塔阻拦云云，只是民间传说罢了。

《廉州府志》说杨为楨“**重道崇儒**”，说明他相信风水。他为“**建塔于阳江之冈**”，还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研究，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了集体决策。

议定之后，杨为楨说干就干，鸠工庀材，很快就筑好了塔脚，没想到这时候出了问题：工程款没了。

工程正在推进中，木头石料要买，工地民夫更是一日也断不得炊。一查，原来是看守库房的人中饱私囊，把建塔的钱揣进了自己口袋。

（**已成塔脚，惜库吏干没塔银，中止。**）

《廉州府志》上没有说谁贪了钱，也没有后续怎样处理的记载。要不是这缺德的黠吏，也许

人们现在能在钦江边看到一座宝塔，也许这个塔会成为钦州的一座标志性建筑。

须知含浦的文昌塔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比它还要早一些，至今仍巍然屹立。

杨为楨力推的这项工程，遭遇了“滑铁卢”。府志说他“**浑厚精明，为政有体**”，他也许“浑厚”有余，但精明似乎不足，导致他那么不遗余力的一个项目，居然因手下贪渎变成了泡影。

他做到了“科学决策，方向正确”，但没有做到“方法正确”，不能保障“上下一心”，导致最终未能“把事干成”。

大概建塔之事成了杨为楨永远的痛，所以塔没建成，他又筹划在钦州文昌阁前面建一座三元阁。

也许是吸取了教训，或者是工程量不大，这个阁倒是建成了，算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。

有人可能认为建塔建阁只不过是形象工程，但现在的一些名胜古迹，何尝不是历史上的形象工程？读历史不宜用现在的尺子，度量过去官员的言行。

杨为楨是个恤民之官，除了热心建塔建阁，他看到每日钦江两岸撑船往来不便，还想方设法修复了平南浮桥，赢得人们的赞誉。

杨为楨在钦州另一个突出政绩是“**严禁冒籍，详分土附**”。

明朝的户籍管理很严，但因为灾害、匪乱、战事以及从事商业等，出现许多“附户”现象，把不是同一家的人，编进同一个户口入籍。

由于涉及土地耕作和征税，这样的情况对社会管理显然不利。杨为楨在这一块花了不少力气，也有所成效。

杨为楨闲暇时间还经常“亲自”给学堂的学生讲课，与他们切磋经学。国家通过科举擢拔人才，因此敦学兴教是府、州、县主官最重要的职责。那时候的官员都是学校的常客，兼做教师。这并不是他们平易近人，而是不这样做就是失职。府志中很多官员都有亲自掌教的记载。

因为风评好，杨为楨从钦州知州提拔为陕西巩昌府的同知，也就是知府的副职。钦州人在他离开后，专门在渡头建了一间祠庙来纪念他。